

声音

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初稿

汪荣

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者密不可分,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如果说文学史偏向历史化,文学理论偏向哲学化,那么文学批评介于两者之间,是借助文学理论的武器,发挥个人的批评才华,对当时历史情景中的文学作品进行的审美阐释与价值判断。因此,文学批评既体现了历史的现场感,又体现了理论的思辨性。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论述”,本身包含了很强的“文学性”,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

从历史化的视角来看,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史建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新闻业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作“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大意是今日之新闻乃是明日之历史。模仿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初稿。对于文学史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的参与,起到了促使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作用。正是文学批评所做的初步准备工作,才使文学史的书写变得相对简单和精确,从而促进了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

文学批评凸显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

“历史化”是近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是当代文学追求学科化和知识化的结果。与此同时,“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毫无疑问,近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正在努力突破文学的固有框架,不断地与社会和历史进行对话,而这正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化的表征。

文学史的研究,总是尝试在总体性的视野中观照文学,尽量去还原真实历史的现场。文学的历史,不仅有作家的参与,还有读者、批评家等其他人员的存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场域。在文学史的考察中,我们甚至会发现,那些边缘作家和作品的线索,我们常常是从当时批评家的文章中得知的。因此,要还原文学史全景,就必须重视当时当地的文学批评。恰如王尧在《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中所说,“即时的文学批评则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论述基础”。

文学批评之所以能构成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基础,那是因为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同时代性”和“现场感”。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对同时代文学状况的回应,体现了他们与文学现场的“贴身肉搏”,是用具体行动参与的文学生实践,展演了文学认知的“具身性”(embodiment)。例如,新世纪以来,各种对于文学现象和创作思潮的命名都有批评家的身影,如“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等。可以说,正是批评家对文学现场的参与、发现与命名,提供了后续文学史写作的坚实基础。

文学作品并非孤立于时代,而是深深内嵌于时代、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相对于作家而言,批评家既是文学现场的参与者,又是文学创作的旁观者和评判者。文学批评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凸显了文学场域的动态性,体现了创作的历史语境。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起,构成了一幅真实、鲜活与完整的历史图景。

大致从上世纪末以来,乡贤文化研究渐为人关注,相关成果不断出现。赵普光等编著的《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中国现代文学中乡贤文化文献叙录与编年纪事》(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3年12月版)就是其中的一种。

《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将乡贤问题放置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框架之内,关注乡贤这一群体的文化属性。作者对乡贤问题有着文化上的自觉意识,试图回到百年中国新文学与文化的现场,捡拾那些为文学史叙述所舍弃而零落的碎片,将其拼接为社会与文化转轨时期乡贤文化境遇的全貌。全书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三部分。其中,上编为“文学文献叙录”,从百年新文学作品中选取各类有代表性的乡贤叙事,以乡贤的文学境遇为思考原点。中编为“研究文献叙录”,涵盖了乡贤叙事的文学评论与乡贤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梳理出前人研究乡贤的文化理路。下编为“编年纪事”,通过对1898年至今关涉乡贤的重大历史、文化、文学事件进行编年,为乡贤文化境遇的历史性阐释提供更为立体开阔的时代空间。

这样看来,《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体现了一种“以史料为方法”的编撰理念。乡土文学自有其复杂性,近百年来的创作与研究浩如烟海,且总是与乡土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代肌理相连。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历程不过百余年,人们与乡土社会仍有着深刻的情感牵绊,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对乡土社会的指认与描述也总是叠加着多种多样的情感因素。因此,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乡土文学现场中寻得一条研究通路,以回应文学与文化的转折,观照乡土世界的现实情境,并与人们心中的“乡愁”对话,就成为诸多研究者的现实渴求。在近十余年内,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乡贤这一群体在近现代历史转折中的境遇,从而为

(上接第1版)

在浙江,新编越剧《新龙门客栈》将传统戏曲与新演艺空间有机结合,持续走红网络;在山东曲阜,大型乐舞节目《金声玉振》尽显古风古韵;沉浸式家庭音乐剧《用端》驻演版创新形式,让故宫文物“活起来”……中华大地上,一场场生动的文化创新实践不断上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志愿军:雄兵出击》《问苍茫》传承革命光荣传统,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雪山大地》《宝水》书写祖国山乡巨变……

过去一年,一部部充满力量的文艺精品力作,以新故事、新形象、新旋律、新风格抒发人民奋斗豪情,传递民族精神之光,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8.2%。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文娛休闲行业快速恢复,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已设立6700多家非遗工坊,“老手艺”成为群众就业增收新亮点;贴合百姓需求,超3.35万个颜值高、内容多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人们身边的文化客厅;重塑“诗和远方”,旅游日渐成为富民乐民的幸福产业……

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它们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交叉、彼此促进的。事实上,很多评论大家、文学史研究大家,都兼顾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两方面的工作。他们的论述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结合的可能性

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一方面要注重文学创作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批评家、批评论述和批评史,两者不可偏废。

文学知识需要进行循序渐进的积累

作家的创作,是将自我的生命经验作为养料进行的文学生产。批评家的论述,是以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为依托进行的批评实践。而到了文学史家这里,则更加“踵事增华”,是对文学历史总体情况的考察和讨论。

从作家的创作到批评家的评论,再到文学史家的总结,是不断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经过一个又一个阶段,文学知识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转化和提炼的工作,中间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消化、吞吐、重建”。

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处在作家和文学史家之间,是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阶段。批评家身处时代的现场,就已经在进行优胜劣汰、披沙拣金的工作了。他们对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去判断质量的高下和品质的优劣,并不断进行“经典化”的建构。后来的文学史家,正是在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参考同时代批评家的论述,在深度辨析的前提下作出自己的评判。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还原历史真实。文学史家会对作家和作品作出主次轻重的权衡,进而在论述上进行详略粗细的安排,甚至会规划写作篇幅的长短。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重要来源之一。从当时当地的文学批评到后来的文学史的构建,是一个文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从特殊到普遍,从文学批评的个案到文学史的整合,文学史的写作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来自文学史研究者对作家创作和批评家论述的“消化、吞吐、重建”,而文学批评无疑对后面文学史的书写作出了重要贡献。

批评的价值判断影响文学史的写作

如果说文学创作更加依赖作家的感性 and 直觉,遵循的是想象力的逻辑,那么文学批评是对作家作品进行的讨论、品鉴和

评判,遵循的是理性的逻辑。文学批评的写作是一个思辨展开的过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就不需要“直觉和感性”。与之相反,优秀的文学评论恰恰需要批评家主体意识的投入,需要内心燃烧的批评的热情。

批评文章的背后,其实站着的是批评家这个人。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脾气和风格。个体的差异会带来批评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情感的投入会影响他们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批评家对同时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也会影响到后面文学史研究者的判断和书写。例如,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杂志上刊登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进行了十分精准与独到的批评,指出了张氏写作的优点和问题。这篇文章不仅影响了张爱玲后续的写作计划,也是后来文学史家研究张爱玲的重要的对话对象。此外,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是一篇发表于1980年的重要评论文章。谢冕依赖批评家的敏锐与洞察,旗帜鲜明地为当时新兴的“朦胧诗”辩护。而他当年勇敢的发声,为后来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判断的依据。

文学史研究者有自己的主体性、情感偏向和价值判断。但是,作为“后之来者”,文学史家的认知与判断很多来源于材料,并与材料进行对话。文学史的材料,既有文学作品本身,又有文学评论等周边文本,这些材料构成了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基础。在时移世易之后,文学批评本身也被“历史化”了,批评家在当时当地的价值判断,成为了后来学者进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照,也会产生价值判断上的连锁效应。就此而言,文学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文学批评的影响,并在其强大的“影响的焦虑”下进行。

总而言之,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初稿,是文学史的重要准备。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它们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交叉、彼此促进的。事实上,很多评论大家、文学史研究大家,都兼顾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两方面的工作。文学批评让他们的写作充满了对文本的洞察且“笔锋常带感情”,而文学史研究凸显了他们历史的视野和学理的深度。他们的论述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结合的可能性。

(作者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观照乡村文化传承,与“乡愁”对话

姜佳奇

乡土文学找到新的研究支点,并尝试以乡贤研究为契机弥合不同文学史观点之间的裂隙。在这些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从乡贤群体的文学的、文化的、社会的多重属性出发,尝试建立一个宏大又立体的“乡绅乡贤谱系”,将乡贤文化转型时刻的乡土文学、乡土社会情境纳入其中。因此,全书不仅仅是就乡贤谈乡贤,而是为乡贤提供了广阔却又详尽的时代注脚,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

史料的丰富性是编撰的前提,是文献学的基础。《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的细节之中贯穿着编撰者处理史料的思考。书中选取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有《动摇》《为奴隶的母亲》等文学史中的名篇,也有很多文学史中并不习见的作品,编撰者侧重于从乡贤文化的视角出发对作品进行颇具“陌生化”的阐释,还原乡贤的立体形象,进而探寻文本更丰富的时代意涵。在研究文献的选取上,该书通过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打造出多维立体的研究空间。比如,精心选取了乡贤群体转型、分化重大历史节点的相关社会学文献。在20世纪30年代的部分,则将经济危机、农业恐慌、农村社会性质论争的相关文献引入,避免将乡土社会和乡贤进行抽象化的形塑,而是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大视野下对乡土社会所遭受的冲击进行审视,乡贤自然也是内在

展现新气象 开创新局面

放眼神州,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时代文化事业生机勃勃,东方文明古国阔步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新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如何传承赓续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发扬光大绵延不绝的悠久文明,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期待新的书写。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访西湖,走苏轼踏过的堤岸;探庐山,看陶潜爱过的田园……今年“五一”假期,近3亿人次出游,旅游成为“顶流”。人们在追寻“诗和远方”中,感悟文化之美、厚植爱国情怀、筑牢文化自信。

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时深情地说:“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赓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于乡土社会困境的人。可见,《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在史料的选取上,采取了宏观与微观双重视野相结合的方式。

以史料为方法,而非为史料而史料,《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的终极指向仍然是具体问题与现实关怀。该书旨在以乡贤作为百余年来中国中西之间、古今之变的观察窗口,因为乡贤游走于城乡之际,表征着斯文衍变。作者将乡贤视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文化主体,在书中将乡贤群体分化演变的过程,还原到近现代社会广阔而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去。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乡贤作为文化主题的意义问题仍然十分重要。因此,全书并不满足于材料的搜集,而是启迪读者向时代的纵深追索出文化与历史的思考,从而对今日乡贤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回应。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乡村振兴的步伐也日渐加快,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需要人才的引领。人才不仅能助力乡土社会的经济发展,更是乡土文化与礼俗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定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乡贤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个维度上而言,《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的意义就不只是对乡贤文献进行整理与汇编,而是让我们以一种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乡贤文化的古今演变和发展可能。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暨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关注

“现代汉语长诗”自然是和“古代汉语长诗”相对应。尽管古代汉语长诗不多,却很有分量。大体上,屈原的《离骚》是抒情型长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叙述型长诗的代表作。唐代诗人中的李白继承的是抒情型长诗的传统,杜甫、白居易继承的是叙述型长诗传统。事实上,古代汉语长诗中还有一个沉思型传统,其源头是屈原的《天问》,这个传统在古代汉语长诗里只有张若虚等少数杰出的继承人。五四以来,诗人们陆续使用白话文创作长诗,形成了绵延至今的现代汉语长诗创作传统。所谓现代汉语长诗,就是用现代汉语创作的主题重大、诗意复杂、结构精密、篇幅较长的诗歌作品。

很显然,并非任何题材都可以写成长诗。长诗往往用于表达重大主题。何谓“重”?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何谓“大”?孔子说:“死生亦大矣。”由此可见,重大往往事关生死,而死亡的重大在于它是对生命的总结算,没有人能经历并书写自身的死亡,所以主题的重大往往源于他人之死。在这类诗中,他人之死往往成为诗人追忆的起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叙事、抒情与沉思。其次,诗人自身之生也可构成重大主题。这里的“自身之生”一般并非指寻常的生活,而是指紧要关头的生活事件或生命抉择,以及诗人所经历、所看到的重大事件。由于此时心情复杂,这类重大主题往往与复杂诗意纠缠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长诗实质上就是复杂的诗,并常以戏剧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就此而言,长诗往往诞生于时代的提问,完成于诗人的回答。饶有意味的是,何其芳、北岛等诗人都曾用“回答”这个词写过诗。回答式的写作其实是对话的变体,属于单向对话,在动情时则接近于对象未必在场的倾诉。即使那些不以“回答”为题的诗,其实也可以视为对相关社会议题的回答。从这个角度说,那些不能发觉并回答时代之问,甚至不曾触及时代的长诗可能是浅薄的。不过,写这类长诗的难度在于,作者要将时代的突出问题融入个人的具体经验之中,通过个人写出特定的时代。而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便是能否塑造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以及能否提炼出深刻揭示时代本质的意象。总之,个人与他在特定时期的冲突或融合,构成了现代汉语长诗复杂诗意的基础。

与古代汉语长诗相似,现代汉语长诗同样可以分成抒情型长诗、叙述型长诗和沉思型长诗三类。举例来说,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是抒情型的长诗,全诗以凤凰死而复生的传说为结构提炼出毁灭旧“我”以更新自我、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题。闻一多的《渔阳曲》是叙述型长诗,全诗以祢衡击鼓骂曹为主线,格式严谨。全诗十三节,每节十三行,各节均先用五行从视觉角度叙述宴会上的场景,以长句为主,与宏大的场景对应;再用八句从听觉上描摹击鼓之声,以短句为主,与鼓声的节奏对应,形成视听交错的蒙太奇景观。穆旦的《隐现》等长诗是属于沉思型的,以对话的形式传达现实生活中的戏剧化冲突,并将深沉的思想融入诗中。

靠什么把诗意复杂且具有相当长度的诗句组织起来,这对诗人来说是个严峻的问题。衡量一首长诗在艺术上是否成功,主要是看其结构(严格来讲,当然还有思想、语言等等)。首先要看这首诗是否有清晰的结构,再看其结构是否严密,以使该诗成为一个容量丰富的整体,而不是松散的组合、随意的堆积。抒情型长诗往往借助某种主题性的感情构成反复出现的旋律,从而形成该诗的结构。不过,纯粹抒情的长诗容易空洞,依据“充实之谓美”的原则,我更看好那些以抒情为主线、将相关的叙事片段融合起来的作品。叙述型长诗则注重观察其叙述线条是否灵动,表达效果是否突出。相对来说,沉思型长诗的创作似乎更难,我认可的方式是将沉思融入景物描绘、事件叙述之中,以形成巧妙的象征和寓意关系,尽量避免枯燥的直接议论。由此可见,现代汉语长诗的复杂并不只是诗意的,也是诗艺的,这就必然要求长诗作者针对不同题材和主题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以特定的结构统领全诗。

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诗人介入长诗写作,也有越来越多的刊物设置长诗栏目。丰富、复杂的时代生活,召唤诗人们在继承优秀诗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推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诗史”。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本文为常德市宣传部项目“新诗百年研究”(D03148)的阶段成果]

总统有感而发:“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理念和发展历程,对中国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认识加深。”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华文化。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养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坚持守正创新,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024年5月18日,国内首个全景展现秦汉文明缘起、发展和贡献的专题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20公里外,灞河岸边,大型驻场演出《无界·长安》舞台上,秦俑、汉服等经过现代演绎,让历史文化以生动可感的面貌走进公众视野。

传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跨越时空的共鸣亦是对文明的礼赞。融通传统与现代,文脉悠悠,弦歌不辍,气象万千。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唯有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从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文脉中开掘资源、汲取营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面向未来的创造,才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让我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推动中华文化文明重焕荣光!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林晖、施雨岑、史竞男、王思北)

现代汉语长诗论略

肖学周

习近平总书记一段段饱含深情的“文明自述”,让马克龙